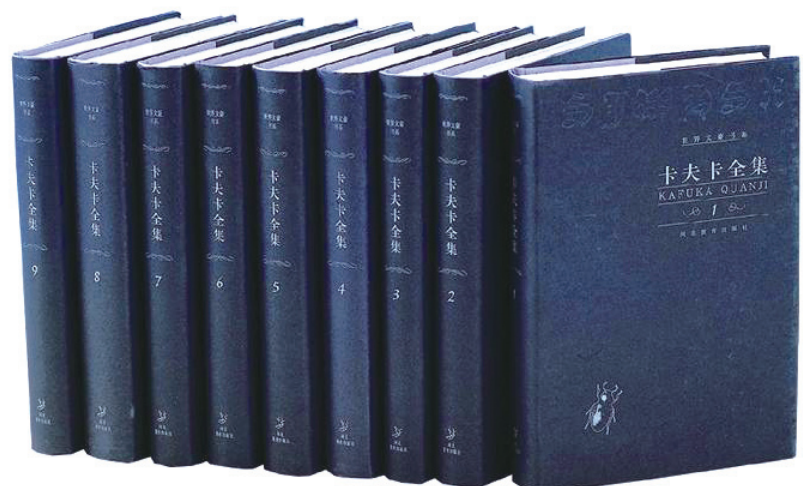




### 弗朗茨·卡夫卡逝世 90 周年：

# 卡夫卡研究在中国

□曾艳兵



《卡夫卡全集》  
我国翻译出版的九卷本

作家弗朗茨·卡夫卡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的明珠城市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的名声与影响正在与日俱增，有关卡夫卡的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显学”，卡夫卡的一切都引人关注。卡夫卡于 1883 年 7 月 3 日生于布拉格，1924 年 6 月 3 日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一周后葬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公墓。对于喜欢甚至迷恋卡夫卡的读者来说，2013 与 2014 年均可算是“卡夫卡年”，因为 2013 年是卡夫卡诞辰 130 周年，2014 年是卡夫卡逝世 90 周年。

美国当代女作家、评论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指出，卡夫卡是 20 世纪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正如奥登在 1941 年说过的那样，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正是这句简短的评点使中国的少数读者日后率先敏锐地发现并注意到了卡夫卡的杰出和伟大。

然而，卡夫卡生前几乎默默无闻，他的作品只有极少数是在生前发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第一版共印了 800 册，5 年后还有一大批积压在仓库里。卡夫卡自己说，在布拉格一家著名的书店里，几年来共售出了 11 册书，“其中 10 册很容易找到买主，因为是他自己买的，不过，他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买走了那第 11 册？”尽管他的挚友布罗德早在 1916 年就指出，卡夫卡是堪与当时德国著名作家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但他的这种评价在当时却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卡夫卡作品第一个法译本的出版是 1928 年，这时卡夫卡已经去世 4 年了。二战后，经历了一场噩梦的欧洲终于发现



卡夫卡部分作品中译本

了卡夫卡的价值和意义。1950 年，随着布罗德新编的 9 卷本《卡夫卡全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随后，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流派，如荒诞派、新小说派、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都纷纷去卡夫卡那里寻找渊源和灵感。1962 年，萨特在莫斯科和平和裁军会议上把卡夫卡比作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一块试金石。1963 年，在卡夫卡诞生 80 周年之际，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家和西方共产党员文艺评论家一起在卡夫卡的家乡布拉格举行了“卡夫卡学术研讨会”，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家也开始关注、思考并研究卡夫卡。

在中国，在很长时间里读者对卡夫卡都是比较陌生的。以笔者所看到的材料来看，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名字的是茅盾，他在《小说月报》第

14 卷第 10 号（1923 年 10 月）《海外文坛消息》专栏中发表了《奥匈现代作家》一文，文中写道：“从那绝端近代主义而格特司洛，而卡司卡（Franz Kafka），莱茵哈特（Emil Alphonse Rheinhardt）以至于维尔弗（Franz Werfel），都是抒情诗人，而且都可算是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茅盾将卡夫卡译为“卡司卡”，将卡夫卡评述为“抒情诗人”，“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显然颇为隔膜，可见当时茅盾对卡夫卡的了解非常有限。1930 年 1 月赵景深撰写的《最近的德国文坛》一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 21 卷第 1 号，文中有关卡夫卡的评述达 500 余字。这次卡夫卡被译为“卡夫加”，文中尚有许多不实之词。1936 年 6 月 1 日，赵家璧译的德国作家雅各布·沃塞曼（Jacob Wassermann）撰写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发表在《现代》杂志第 5

卷第 2 期上，文中有一小节为“犹太作家考夫加”，卡夫卡被译为“考夫加”，文中对卡夫卡的介绍语焉不详。1944 年孙晋三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 4 卷第 3 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卡夫卡说起》一文，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短文，卡夫卡也终于有了现在这个译名。

1948 年天津的《益世报》刊登的由叶汝琏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大概是国内对卡夫卡所写的文字的最早翻译。在解放后的头 10 年，据杨武能回忆，“大学外文系德语文学专业的教材中和课堂上根本不提他的名字；在一部 1958 年出版的影响很大的文学史里，哪怕批评的话也没有一句”。1966 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 6 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1979 年《世界文学》刊登的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评介卡夫卡的文章。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中国大江南北游走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抛头露面。1981 年底钱锺书先生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卡夫卡来到中国》的文章，宣布卡夫卡在这个世界上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中国“安家落户”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实质上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的（台湾对卡夫卡的译介和研究比大陆要早 20 年，50 年代末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就在他们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介绍卡夫卡，1960 年出了一期《卡夫卡特辑》。当时卡夫卡是随同萨特、加缪和存在主义一起进入台湾的，但台湾的卡夫卡研究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1979 年至今，我国的卡夫卡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卡夫卡不仅成为我国学者关注最多、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对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卡夫卡的小说还被选入中学课文，成为千家万户普通读者的阅读对象。卡夫卡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深远，这些作家主要有莫言、余华、格非、马原、徐星、刘索拉、皮化、蒋子丹、残雪等。可以说，卡夫卡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时至今日，卡夫卡几乎成了一个时髦、现代、复杂、悖谬、荒诞、空虚，甚至房子、家具、装饰等的文化符号，为无数读者所喜爱，甚至热播。“今天的任何一种文学语言都明白形容词‘卡夫卡式’或副词‘卡夫卡式地’是什么意思。”“卡夫卡主导着一切！”“卡夫卡之后，所有文学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了。”虽然不能说世界都已经变成卡夫卡式的了，但卡夫卡式的已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重要特征之一了。

搜寻中国知网（2014 年 5 月 20 日），我们发现自 1979 年以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卡夫卡的研究文

章有一千余篇。其中 1980 年以前 3 篇；1980—1990 年 38 篇；1990—2000 年 113 篇；2000—2010 年 698 篇；2011 年至今已有 395 篇。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卡夫卡的身份归属问题，卡夫卡创作的基本特征、主要作品研究，卡夫卡与其他作家、尤其东方作家的关系研究。当代美国理论家詹姆斯·卡夫卡的主题，无外乎以下三种：俄狄浦斯情结或自渐形秽的内疚感；官僚专政或现代性的反面乌托邦；上帝、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或我们与上帝缺场的关系。”这三种主题也是我国学者集中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只不过其中的顺序略有不同。

在西方学界，最早传播、阐释、翻译卡夫卡作品的是布罗德和缪尔，他们一开始更多地强调的是卡夫卡作品的形而上意义，放大了卡夫卡作品的预示性意义。他们将卡夫卡看作是一个追寻上帝的现代圣人，通过他的作品建构读者过一种道德完善的生活，而《城堡》就是一篇宗教寓言。随后存在主义作家开始注意到了卡夫卡作品中“存在”意味。加缪、波伏瓦、萨特都对卡夫卡有过专门的评述。考夫曼编著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干脆就将卡夫卡纳入其中。这以后西方学者对卡夫卡的解读和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东欧学者开始注意到卡夫卡作品对官僚机制的嘲讽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寓言，同时也认识到了卡夫卡作品对异化世界的描绘和讽刺；西欧学者则更注意卡夫卡作品的形式，甚至将卡夫卡的作品当做一种半私人化的文字游戏。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对于卡夫卡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仅从简单的社会、历史角度进行研究，他们通常直接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或其他相关理论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譬如《变形记》，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一篇“表现‘异化’主题的代表作”。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成果当属叶朗的《卡夫卡——异化论历史观的图解者》一文，日后从异化理论阐释和研究卡夫卡的著述，很难超越此文。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学人的卡夫卡研究开始转向，他们不再满足于对卡夫卡及其作品进行宗教研究和道德化解读，更注重对其进行解构主义批评和社会政治批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考恩戈德（Stanley Corngold）1988 年出版的《弗朗兹·卡夫卡：形式的必要性》。卡夫卡俨然被看成了一个解构主义尚未出现之前的解构主义者。另外，伊丽莎白·博恩（Elizabeth Boa）的《弗朗兹·卡夫卡：信件和小说中的性别、阶级和种族》（1996）和吉尔曼（Sander L. Gilman）的《弗朗兹·卡夫卡：犹太病人》（1995）则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杰作。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学者也渐渐抛开“异化”说，开始从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叙事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角度来分析和阐释卡夫卡的作品，从而使我国的卡夫卡研究出现了一种新气象。

## 动态

### 纪念莎士比亚诞辰 450 周年

## 全国莎士比亚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 450 周年，全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中莎会）年会于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包括莎士比亚的世界性和英国性、莎士比亚与中西文化比较、莎士比亚汉译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改编与演出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教学研究、莎士比亚研究与中国哲学学者的主体性等展开讨论。

几百年流变，莎士比亚已然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莎士比亚如今的文化地位，南京大学教授王守仁在主题发言中梳理了莎士比亚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的历史过程，认为莎士比亚本身不同寻常的文学才能奠定了其“文学天才”的美名，其作品以人性的关怀和思考而具有持久的魅力，吸引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历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化批评者对其价值的挖掘使他诗名远播，他的崛起与英国的帝国建构和文化输出息息相关。莎士比亚文化价值的确立过程同样能给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播发展带来启示。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同样值得关注。北京大学教授章坤从作品影响力和受众接受两个角度探讨了如何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国文化背景以及翻译语境中研究、鉴赏莎士比亚作品。东华大学教授杨林贵认为，莎士比亚自从进入中国以来就被当成现代文化的代表，中国对他的作品的接受也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提出“是否有现代性概念可以谈论现代中国和现代西方的莎士比亚”、“现代中国如何参与了莎士比亚现代意蕴的建构”、“全球化时代莎士比亚的文化资本以何种方式在中国流通”等问题供与会者讨论。中国学者是否只能从中国角度研究莎士比亚？对于这一问题，西南大学教授罗益民有自己的思考。罗益民认为，不同种类的文学、文化具有异质特性，是无法移植和改变的，莎士比亚现象中定然也有异族文化不可理解和不可利用的因素。但否认文化异质的可认知性，便失去了欣赏莎士比亚文化大花园中美之良机的良机。因此，中国莎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必非局限于中国角度，这样可以拓展中国莎学的研究方向，真正走向莎学前沿。

在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的作品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母题，为后来的作家和文化学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莎士比亚文本研究和影响研究也成为此次会议上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罗小云从菲利普·罗斯的作品《萨巴斯剧院》中探讨莎士比亚的影响，他认为，该小说参照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人物形象和情节，对当时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及其影响加以艺术再现，从新现实主义的视角描述了那一代人的悲剧和挫

折。罗斯想以此指出如果忽略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式的悲剧将不可避免，福斯塔夫一类人物的出现也不足为奇。王卫东在发言中则探讨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与莎士比亚的关系，奥威尔在学术散文《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弄臣）中直接阐述了他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和理解，王卫东认为，奥威尔的作品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艺术观念与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传统一脉相承。

根据莎士比亚剧作所改编的电影一直都是银幕常客，并成为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热点，会议上，不少学者就此话题交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舒笑梅就在论文中探讨了根据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三世》改编的电影《寻找理查》与原作的互文性。《寻找理查》是由好莱坞演员阿尔·帕西诺执导的一部纪录片式的戏剧片，帕西诺通过各种尝试，力图拼贴还原一个“我们今天所感所想到的莎士比亚”，努力实现从古典作品到当代理解的互文效果，创设了从精英小众到普罗大众的开放文化消费空间。马芸则分析了中国导演林兆华的改编剧作《哈姆雷特》和《理查三世》的舞台演出，认为林兆华把莎剧传统、现当代西方戏剧理论和中国戏曲及曲艺艺术融会贯通，积极解构传统，客观反思当代。其剧作中的故事被淡化，人物性格被淡化，但对人性和历史的思索却凸显出来，为中国戏剧舞台改编莎剧提供了宝贵经验。刘明璐、孙明钰也从受众角度出发，探讨了好莱坞莎士比亚青春电影的改编策略。

研讨会上，还有学者以当代较新的文化理论反观莎士比亚的作品，为莎学研究提供了新颖有趣的研究视角。南京大学教授杨金才在全球化视野下重新审视莎氏悲剧《威尼斯商人》，认为该剧不仅具有某种全球化视野，展示出交互关系中的流动性与迁移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警示读者，一种地域性文化应如何应对外来影响以确保自我独立性。贵州大学教授李梅探讨了生态批评视野下的莎士比亚“荒野”观，她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荒野意象随着创作阶段的变化呈现出流变过程：荒野作为理想之地、荒野作为放逐之地和荒野作为回归之地。这一过程反映了莎士比亚对“荒野”及自然的认识上的变化，暗合了生态批评中西方人对于荒野意象的认识的转变，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具有超前的领悟和认识。刘玉红则通过对论文集《哥特的莎士比亚》一书的解读，展示了莎剧的哥特魅力。莎士比亚的巨作包含了很多哥特元素，如鬼魂、悬念、恐惧、文化焦虑等，哥特作家大量模仿、借用、改编这些元素和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哥特小说的发展。

（王杨）

## “蓝色东欧”译从新书分享会举办

【本报讯】5 月 31 日，“蓝色东欧”译从新书分享会“等待黑暗等待光明——漫谈克里玛及东欧作家”在南京先锋书店举行。《世界文学》主编、“蓝色东欧”译从主编高兴，东欧文学研究专家景凯旋，作家黄梵等嘉宾分别从译者、读者以及写作等角度讨论了克里玛等东欧作家，与文学爱好者们一起分享东欧文学阅读心得。

伊凡·克里玛是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有着巨大的创造力，与哈维尔、昆德拉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纽约时报》评价其作品是“一种能从存在于国家强制压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压抑下的普通金属中提炼出金子的炼金术”。“蓝色东欧”第二辑收录了克里玛的短篇小说集《一日情人》，小说里的情人们在一夜或一日间偶然相逢，通过错乱的情欲表达，宣泄出现实中的精神压抑，让人慢慢品味出背后的荒谬。此外，“蓝色东欧”系列也将陆续推出《我的金饭碗》《等待黑暗》《我的疯狂世纪》等多部克里玛作品。谈到克里玛，与会者认为他的创作很平凡，带有一种抒情性，但同时具有一种巨大的悲悯。有嘉宾认为，克里玛的小说中，主人公对于环境从不抱怨，这一点非常像卡夫卡。克里玛笔下的人物都把孤独和不堪留给自己，但对别人怀着美好的想象。黄梵认为，克里玛介于哈维尔和昆德拉之间，他既有幽默的特质，又有哈维尔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高兴在谈到克里玛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处理时说，他能把其中的复杂性

细腻地传达出来，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却在字里行间让故事本身呈现意境。

“蓝色东欧”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计划引进 20 世纪以来中东欧文学杰作 100 部，汇集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享誉国际的作家，如卡达莱、克里玛、赫贝特、米沃什、布拉加、赫拉巴尔、莱姆、扎加耶夫斯基等。丛书第一辑于 2012 年出版，今年推出的第二、三辑涵盖小说、诗集及箴言录等多种文体，涉及众多作家。匈牙利“终身成就优异奖”获奖作家瓦莫什·米克洛什的长篇小说《父辈书》，是一个家族 12 代长子的命运之书，一部横跨 300 多年的匈牙利历史长卷，仅在匈牙利国内便售出 20 多万册，已译为 13 种不同语言在各个国家出版，被誉为匈牙利的《百年孤独》。《10 个流浪汉，或者虚无——托马·萨拉蒙诗选》则精选了斯洛文尼亚诗人萨拉蒙诗作 160 多首，是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萨拉蒙诗集，展示了这位中东欧先锋派代表诗人背后的精神国度。《索拉里斯星》是波兰科幻文学作家莱姆的代表作，它被看作经典科幻小说的典范，被列入最基础的科幻文学导读，与威尔斯、斯塔普雷顿和狄克比肩。《神殿的基石——布拉加箴言录》收录了 2000 余则布拉加箴言。作为现代罗马尼亚文化杰出代表之一，布拉加集诗人和哲学家于一身，以隽永的诗的语言将哲理凝练为箴言，透视人生和形而上的疑问。（王杨）



奥地利画家奥斯卡·科柯施卡作品《风中的新娘》

#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